

〔俄〕索罗宁 著 ● 栗瑞雪 译

十二回

连环画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

印制

发行

总经办

零售

批发

零售

零售

零售

零售

零售

零售

零售

零售

零售

西夏研究丛书 · 第五辑

十二回

〔俄〕索罗宁 著 ● 栗瑞雪 译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国 / (俄罗斯)索罗宁著 ; 粟瑞雪译.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227-05301-9

I. ①十… II. ①索… ②粟…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
战国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K2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5853 号

十二国

[俄]索罗宁 著 粟瑞雪 译

责任编辑 陈 晶 马宗明

封面设计 伊 青

责任印制 张国祥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9 字数 88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12596 印数 2000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5301-9/K·739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 序

圣道虽不朽，不依人侧衰，学术之功劳，非为共而作，若非此，岂能盛与哉？学术虽曰为一人所造，岂非大家之共力哉？

西夏文《十二国》之研究，虽为余之所造，但实为多人之共同贡献。西夏文《十二国》，为余初解西夏文入门之书也。1992年，余立决心，以西夏学及西夏佛教研究为业，遂向克恰诺夫教授求学并拜其为师。老先生爱而谓余曰：“尔何不作《十二国》之初步研究乎？其可为尔学西夏语之入门也。此研毕，乃后作佛教之研究，可也。尔先应学其语言文字，以西夏文字与中文资料核对而读之，乃为学西夏语之便捷易道，然乎？”于是，吾对陌生之西夏文，听师谆言，对曰“可”，遂入手而习研之。

初，余尚在列宁格勒大学就学，乃以《十二国》卷一之俄文翻译，为毕业论文。此时，列宁格勒大学改名为圣彼得堡大学，余又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博士班求学，心仍在西夏佛典之研究。届时，老先生谓余曰：“《十二国》研究不可弃也，事必有始有终，务必完成其业。”于是余乃勤进，在1994年，完成《十二国》之翻译、注解等工作。此时，幸见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创始人，伊·亚·阿利莫夫教授。其圣彼得

| 十二国

堡东方学(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出版社初立不久。教授乃谓余曰：“尔《十二国》译本完成已久，在吾社出版，如之何？”余时未满30岁，不为人知，也未获博士学位，有人不请而有意为余出书者，不甚之乐，难以尽说。后，余以出书之说，告于老先生，先生喜曰：“可。”于是，此书得以出版。余深谢伊·亚·阿利莫夫及夫人，无二位大德支持及热诚指导，此书则无法早日出版。老先生为余指教之恩，则终生无以报。《十二国》俄译本为1995年出版，虽为余最初之著作，实乃克恰诺夫老先生，阿利莫夫教授和夫人指导、关爱、提携之结果，大恩大德，感谢无尽，在此致意，略表寸心。

研究《十二国》时，余尚未通西夏语，迄今之进步，亦不甚大。当时，年少轻狂，对西夏充满浪漫之感。在余眼光中，西夏非为研究领域，而为“知而不言万密之国”，于是，始以解开其深渊之谜为终生之事。由此观之，当时之研究立场颇为偏怪：《十二国》之俄文翻译，虽不见太大之讹误，但研究结论，乃甚足为奇，可曰余对《十二国》本质误解甚大。主要是，此书为简略历史故事之集，其结构、内容与唐宋世俗文学颇为接近，是否为特定中文原典之译本，乃迄今不得知。而浪漫之余，乃将《十二国》内涵结构之起源，寻址在古，以为此书与春秋战国时期“国别”题材有共同之来源，对书内之文章顺序，有莫名其妙之理解等，并提出西夏文学“三层次”理论等。如此等等说法，尚无足够证据；为此等等不足，实有甚多遗憾，在此，特向读者诚恳致歉。余1995年首出之《十二国》一书，其中缺点与不足之处，早为同僚所发现。其中聂鸿音老师等人，觅其所短，补其所缺，贡献莫之大也。既如此，余亦对《十二国》之研究评价不高，且早知必补之处颇多，但余专心于西夏佛教典籍之研究，故未将《十二国》置于心中。

前三年聂鸿音教授言于余：“有人译《十二国》，尔知之否？”余对曰：“西夏文《十二国》研究价值颇高，早已得翻译研究其句法、语音音

写等,终于译之,为学术之贡献莫大焉。”师乃言:“其所译即尔《十二国之研究》,并非其西夏原文,译者热情用功,望尔会阅其译本。吾已阅其初稿,并修润其文,觉译者功德无量,且杜建录院长有意出版。”余当知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杜建录院长愿意出此书,则犹豫不安;其为余早期不完整之著作,似乎人不知之而不温。杜建录教授愿以西夏学院名义出之,其荣誉莫之大矣。但学界当仁不让,而《十二国》译本研究不当之处甚多,余岂不悲乎?时余不知何之应。聂老师仍不放弃,期年乃见余曰:“翻译完毕,尔愿览之乎?如此常拖,亦非好事。译者下工夫,建录先生万忙之暇心存此事。”余乃初见粟瑞雪女士之译本。

粟女士译《十二国》之事,使余快乐无尽,可曰,其译文善于余之原文:原文缺而补之,繁而简之,文之顺,亦甚可叹之!余曾议之:最初研究《十二国》大部分典故原文,现于不同文献,而余亦曾未确认来源之典故,此皆为聂鸿音教授等补充,可曰《十二国》中之大部分典故,皆知其来源。俄版本有原始典故相关记载及翻译,但未供原文,不便于参考。余以为,有原文记载,会增加《十二国》中译本之研究价值。粟女士按俄文版之载,在其中文译本中,作不同典故而另补其原文,便于读者核对分析。粟女士如此功劳,为此书之巨大之改进改善。非粟女士之力,岂可立之哉!若夫粟女士之不请而译之补之,聂老师之立功而改之修之,杜教授受之出之,此书岂能成而问世乎?余存疑之。余惟愿此书彰显三位大德之功。

近几年,余常受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之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之维护,真为此踊跃不尽。《十二国》译本之出版,亦为院长杜建录教授赞而推,粟瑞雪女士译而补,聂鸿音教授改而润,三位发展西夏学业之精神,尽显于此。近年宁夏之西夏学得以盛行,非杜教授倾心之力,岂能有如此之美哉?聂教授归命于西夏学,若非天命而有,岂亦可乎?粟女士精通俄文,爱怜西夏学,非凡人所能至。其人虽年轻,但

|| 十二国

其对西夏学之贡献不朽，路人皆知。至此，感谢诸位指导帮忙，学恩有报。此书立功立德之名，则当归于三位大德，其不当之讹，则尽归于余。如琢如磨，可为精玉；如补如削，可为精器；入神化疵，可为精学。学业者，当如此。是为序。

索罗宁

2012年4月27日，在宜兰礁溪

目 录

CONTENTS

汉文本《十二国》的成书时间、
原文出处及内容特点 /1

译 文 /23

注 释 /66

《十二国》中汉文与西夏文人名对照表 /103

西夏文本影印件 /106

汉文本《十二国》的成书时间、原文出处及内容特点

—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着一本题为“十二国”的西夏文刻本(科兹洛夫收集品, Танг-12),现存部分不完整:原书上、中、下三卷,仅存上卷和中卷。这两卷书保存状况良好,但其中略有残佚,难以做到全文的翻译。著录的书题“十二国”是抄录了位于版口的简称,书的全称尚不得而知。现存部分没有序跋,无法确定该书译成西夏文的时间。

《十二国》辑录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8~前 3 世纪)的一些故事,包括发生在晋国、齐国、后齐(田氏)、魏国、鲁国、赵国的史实。叙述史实按地理分布原则:述及一个国家时分作若干章,却不管时间的先后,材料编排有些混乱。^①比如在齐国篇里首先提到的是齐景公(公元前 548 年~前 490 年在位),然后才是齐桓公(公元前 685 年~前 643 年在位)^②,而有关孟尝君的著名典故则被放在了其

^①克平:《〈十二国〉——保存在西夏译本中的汉文作品》(К.Б.Кепинг, «Двенадцать царств» — китайское сочинение сохранившееся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1974), 第 63~66 页。

^②同上,第 65~66 页。

|| 十二国

父靖郭君在世时发生的故事之前。

《十二国》中的每一“国”^①都以简短的引言开篇，引言中包含了该国创始人的资料、对周王朝的态度、该国何时成为霸主以及何时因何而灭亡。

由于不知道完整的书名，所以无法指出《十二国》的汉文原本名称。也许，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这个译本出自《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作品——宋代孙昱所著《十二国史》十二卷或《十二国史略》三卷。^②由于西夏文《十二国》本为三卷，人们自然会想到这个西夏文本就是《十二国史略》，但无论是西夏文本还是汉文本，这两部文献都未流传下来，迄今仍不为人所知，任何勘同都只能是假设。这种勘同不可能只根据《十二国》这一部著作：《宋史·艺文志》中提到了一系列作品，同样也把这部著作列入其中。^③最后不排除一种可能，即该书根本不是从汉文本译来的，而是依据西夏国内各种不同汉文作品编纂的中原历史故事集。克平研究的《新集慈孝记》可以作为这种编著的例子^④，但该著作的特点是在叙述史实时遵守事件发生次序的连贯性，并根据中国通用的规范按题材分类组织材料。^⑤因此，《十二国》的叙述有些杂乱无章，这正好驳斥了该书是在西夏编

①“十二国”的名称由“春秋五霸”加“战国七雄”得来。

②克平：《〈十二国〉——保存在西夏译本中的汉文作品》(К.Б.Кепинг, «Двенадцать царств» – китайское сочинение сохранившееся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1974), 第 63 页。聂历山：《西夏语文学》(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第 1 卷, 第 86 页。

③《宋史·艺文志》,《二十五史》,上海:1987 年,第 12 卷,第 5811~5812 页。

④这部作品是一个叫曹道安的人根据西夏境内的各种汉文资料编写的。参看克平《新集慈孝记》(К.Б.Кепинг, Вновь собранные записи о любви к младшим и почтении к страшним, Москва, 1990), 第 9 页。

⑤比如刘向的《新序》和其他作品按不同题材分类，这传统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纂的观点。这部著作多半还是译自汉文本。

把这部书与古汉语的类似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澄清《十二国》的原著问题。在缺乏原著的情况下不可能直接进行文本分析，因此不得不考虑一些纯形式上的标准：其他文献中存在内容相似的片段、人物名字的差异和论述同一事件时的差别等等。为了证实《十二国》中故事的同一，我参考了以下汉文作品——司马迁的《史记》、《春秋左氏传》、《国语》以及汉代刘向（公元前 79 年~前 8 年）的著作：《说苑》、《新序》、《战国策》。此外，还用到了《韩诗外传》、《吕氏春秋》、《韩非子》和《列子》。

在早些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认为《十二国》可能与《说苑》之类著作有些相似。^①可是，与《十二国》的结构和内容相似的文献绝对不止《说苑》一种。

根据地理原则排比史料是中国早期史书的典型特征之一。作为最早史书之一的《国语》正是这样写成的。还有《战国策》，据编者刘向指出，也属于他早年校订并补充的、“因国别”的作品。^②《国语》和《战国策》这两部书都遵守所述事件发生次序的连贯性，而且《战国策》完全是刘向的校订成果。^③《国语》也是经校订而成，尽管不清楚该文献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在何时校订过它。

因此，中国早期俗史书的特点是按地理特征组织内容，叙述有些

^① 克平：《〈十二国〉——保存在西夏译本中的汉文作品》（К.Б.Кепинг, «Двенадцать царств»—китайское сочинение сохранившееся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1974），第 65 页。

^② 参看塔斯金译自汉语的《国语》（В.С.Таскин, Речи царств [Го юй], Москва, 1987）；《战国策》，《国学丛书》第一种，上海，1958 年。

^③ 《战国策》卷一。瓦西里耶夫：《战国策》（К.В.Васильев, Планы сражающихся царств, Москва, 1968），第 45~46 页。

|| 十二国

杂乱无章,后来的编撰者克服了这一缺点。^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结构来看,《十二国》源于刘向编写或校订的《战国策》及其他作品,以及《国语》在某种程度上建立的古代俗史学传统。^②作为对《十二国》古代原本有利的补充论据,它与马王堆出土的文献有些相似。马王堆所出文献中有战国时期的27个历史故事,和《十二国》一样,其特点也是内容编排杂乱无章和不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叙述。^③

研究相同故事的具体情节也可以补充解释《十二国》原本的出处问题。但是书中有些故事,在古代汉文史书——《春秋》、《左传》和《史记》中实际上找不到对应的内容。《十二国》只有两个故事(“后齐”篇的第二章和第五章)和《史记》完全一致,其余所有的章节还要参照其他相关汉文史料进行甄别。《十二国》与《史记》中的故事虽然相似,但还不能把它们直接对等起来,这两部文献在叙事时总是有些差别。^④

《十二国》现存章节记录的主要は战国时期的故事。春秋时期的故事只是在“鲁国”、“齐国”和“晋国”篇中有所涉及。“晋国”篇的三个故事——谴责赵盾、晋景公生病和城濮之战与《春秋》相符,但《春秋》对这些故事的叙述与《十二国》有很大差异。《春秋》记载,赵穿杀死晋灵公之后,赵盾逃离了晋国,后又回国,遭到史官董狐的谴责。孔子惋惜赵盾名誉受损,称他是一位好官。而《十二国》记述的则是孔子指责赵盾最后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晋景公生病的故事,《十二国》的叙

^① 塔斯金:《国语》(В.С.Таскин, Речи царств [Го юй], Москва, 1987);《战国策》, 上海, 1958年, 第7页。

^② 瓦西里耶夫:《战国策》(К.В.Васильев, Планы сражающихся царств, Москва, 1968), 第123页。塔斯金认为,《国语》是为使其与国家的儒教理论产生巨大联系而专门编订的。参看塔斯金《国语》(В.С.Таскин, Речи царств [Го юй]);《战国策》, 上海, 1958年, 第7页。

^③《东方民族文化的手抄本》(Рукописная книга в культуре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кн. 2, Москва, 1988), 第97-98页。

^④《十二国》与《史记》之间的所有差异见注释部分。

述也与《春秋》不同：《十二国》讲的是景公善待医缓，而《春秋》则强调这位昏君因生活荒淫而生病，且无人能治，后来掉入茅厕，死得毫无尊严。^①这些差异使我们得出结论，《十二国》的题材在来源上与《春秋》、《左传》或其他编年体史书没有关系，而是源于另一种可能属于以《战国策》和《国语》为代表的民间杂史，其中自有一些偏离正史的记述^②。而且，《十二国》有自己的时代范围，比《国语》或《战国策》更广：书中涵盖了春秋和战国时期，《十二国》讲述春秋时期所发生事件的篇章与《国语》一致的比较少。^③该西夏文本的内容主要与《战国策》和其他著作（主要是《说苑》和《新序》）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西夏文本与相应作品可以勘同，那么这些故事的汉文本与西夏文本就相当符合。因此，《十二国》“鲁国”篇第十章和十一章的故事就像《说苑》记载的那样，是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叙述的。有两个故事（“鲁国”篇第十五章和“齐国”篇第三章）是根据《韩非子》确定的，而且这两个故事在汉文本的同一篇中。^④有一个故事（“鲁国”篇第五章）可以勘同《吕氏春秋》，除了故事人物名字略有异读之外，西夏文本与汉文本的内容一致。在汉文献中只有《吕氏春秋》收录了这个故事，但在人物名字上与西夏文本略有出入也可以解释为一种迹象，表明编入《十二国》的这个故事并非源自《吕氏春秋》。

然而，并非所有的故事都与汉文献一致。想必西夏文《十二国》的汉文底本不是从著名的文学作品编撰而来，而是另有来源，不止包括

^①引自《史记》和《春秋左传》，见注释。

^②有关《春秋》与《国语》的差异，见《国语》塔斯金译本（В.С.Таскин, Речи царств [Го юй]）；《战国策》，上海，1958年，第5~6页。瓦西里耶夫：《战国策》（К.В.Васильев, Планы сражающихся царств, Москва, 1968），第95~96页。

^③《国语》主要叙述春秋时期的故事，而在《十二国》保存下来的部分中主要讲述的是战国时代的故事。

^④《韩非子》，《二十三子》，上海，1987年，第1143页。

刘向本人作品之类的常用文献。因此,当《十二国》的内容与其他作品等同时,正如前面指出的,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确实极其相似,但不完全一样。在此基础上,似乎很难认定《战国策》、《说苑》、《新序》、《韩诗外传》之类作品就是编写《十二国》时的参考。这多半都是同一类型的作品,源于中国早期编纂史书的一种传统,源于复杂而有趣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题材也可以作为任何一种政治思想或智慧的例证。因此,《十二国》完全可能不是源于宋朝的编撰本,而是更古老得多的中国史书编纂传统。这可以用几点推测来证明。

首先,《十二国》的内容没有任何劝世意义,甚至每篇开头的简短序言也只含有大量信息而没有道德评价。故事表现出的“素朴实在论”和“唯史实派”占首要地位,瓦西里耶夫认为这二者是中国早期史学传统的特点^①,而且故事的趣味性在选材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以下论据证明了《十二国》的全部故事都十分古老:“鲁国”篇有两个故事——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的叙述不能认为等同于孔子弟子宓子贱担任单父宰时的活动。关于孔子这位爱徒的情况鲜为人知,流传至今的、有关他的故事都收录在《吕氏春秋》和《新序》中^②,而且内容彼此重复,但这些书中没有一本包含《十二国》那两章中的故事。有关宓子贱或宓子本人的情况,注释者只是介绍说,他研究过古代世界,又名不齐,姓氏读作“fú”。我们从《汉书·艺文志》得知,有十六篇作品都是由称作宓子的宓子贱编写的。^③后来再没提到这些事。如果假设,根据与《晏子春秋》相似这一点来类推,宓子的文章不是宓子贱本人所写,而只是关于他的故事,那么《十二国》中关于宓子贱的

①瓦西里耶夫:《战国策》(К.В. Васильев, Планы сражающихся царств, Москва, 1968), 第 123 页。

②在《淮南子》中也有关于宓子贱的故事。

③《前汉书·艺文志》,《二十二子》,上海,1987 年,第 165 页。

内容也完全可能是源于宓子的作品。因此,《十二国》的原文应当是汉初编写的,与这一致的情况是,《十二国》原文或原文的雏形与刘向的有关作品相应。

《十二国》在结构上近似于一些源于中国古代叙史传统的文献,如具有代表性的《国语》和《战国策》等。这些文献与《十二国》有确定无疑的相似之处,虽然各自的故事有其独特性,但是可以假设,前面提到的全部著作,包括《十二国》的汉文原本,都源于一组形成于战国末期和西汉初年的主流历史故事。在没有统治思想的时期,随着官吏阶层政治经验的积累,这些故事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因此,这些故事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后来具有了这种功能),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灵活与务实的例证。我们在《战国策》、《新序》和其他文献中发现的也正是这些特点^①,这些特点对于《十二国》的汉文底本来说也是典型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十二国》汉文底本故事的综合性源于中国古代编纂史书的传统,作品本身可以认为与刘向的作品同步。

要准确判断《十二国》被译成西夏文的时间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提出几点看法:该译本大约完成于12世纪中期。西夏在11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尝试把汉文作品译成西夏文^②,但直到12世纪中期前,在成立了翰林院(1162年)和所谓的“内学”(1148年)之后,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才真正开始。^③正是在12世纪中叶编写出了与《十二国》功用

^①《关于〈战国策〉内容的特点》,瓦西里耶夫《战国策》(К.В.Васильев. Планы сражающихся царств, Москва, 1968),第122~123页。

^{②③}(3)克恰诺夫:《西夏史纲》(Е.И.Кычанов. Очерк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1968),第266页。

相近的《新集慈孝记》，并完成了汉文本《类林》的翻译。^①大致可以说，西夏译本《十二国》是在12世纪中叶前后面世的。通过对西夏刻本的印面进行分析也可以证明这一结论，根据间接的特征，可以确定这件刻本也是12世纪中叶的。^②

二

上文已经讲过，在《十二国》、《战国策》和其他一些作品之间有大量故事是吻合的。与《战国策》相应的故事构成了《十二国》中最显著的一组内容。这也说明，大致从战国时代开始，已经有较多的历史故事流传下来，与中国古代其他历史时代相比，故事范围也有比较明显的扩大。如上所述，由于《十二国》与汉代文学作品（如《说苑》、《新序》、《韩诗外传》等）具有相关性，我们可以推测有一组完整的文献，上述所有著作中的故事都来源其中。

考虑到《十二国》与《战国策》的来源相同，可以推测这两部作品的内容有某些相似，但它们之间也有非常重要的区别。

首先我们注意到，《十二国》所录战国时期的材料没有《战国策》全面。即使只根据《十二国》中流传至今的田氏“后齐”篇，也能相当清楚地发现这一点——《战国策》用了六章来叙述齐国这一时期的历史，而《十二国》总共才用了一章。

① 克平：《新集慈孝记》（К.Б.Кепинг, Вновь собранные записи о любви к младшим и почтении к старшим, Москва, 1990），第9~10页。克平：《类林》（К.Б.Кепинг, Лес категорий, утрач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эйшу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Москва, 1983）。

② 克平：《〈十二国〉——保存在西夏译本中的汉文作品》（К.Б.Кепинг, 《Двенадцать царств》 – китайское сочинение сохранившееся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1974），第63页。

《十二国》和《战国策》叙述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

正如瓦西里耶夫所指出的，《战国策》叙述的主题往往不是某个人物，而是一系列具体的历史事实，其中人物的简短话语是为了更直观地重现历史原貌而做出的说明。^①而在《十二国》中，只有一个故事关注的是事件本身（“后齐”篇中的第三章——田单守即墨）。在西夏文本中，叙述的主题就是故事主角所讲的话和表现出的智慧，而事件本身只是突出故事人物言语智慧的背景，而《战国策》本身就有不少辞藻华丽的故事。^②

瓦西里耶夫认为《战国策》中缺少对事件的道德伦理评价——这些事件有的被解释为政治智慧的结果，有的则表现出官员或统治者的无能——《十二国》也不例外。而且，西夏文献的作者常常会忽视一些史实，而这些史实能证明历史事件与某人所起作用之间的直接联系。比如在第五篇中，齐国（吕氏）的灭亡就与齐景公曾经悲悼的晏子去世有关。但众所周知，齐景公去世后，吕氏齐国还存在了相当久（到公元前379年正式结束，即齐景公死后还存在了几乎一百年）。

《战国策》的作者试图突破官方编年史那种述而不评的典型传统，他们努力从客观必然性的角度解释历史事件，展示这些事件在参与者的动机和意图影响下发生的规律。^③类似的宗旨使得《战国策》的作者和编者能把时间上接近的史实排列在一起明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④，同时保持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该国君主执政的顺序就是时间先后的坐标，而《十二国》的特点却同样是完

^① 瓦西里耶夫：《战国策》（К.В. Васильев, Планы сражающихся царств, Москва, 1968），第114~115页。

^② 如关于淳于髡、徐君平、靖郭君、孟尝君的故事被证实可与《战国策》勘同。

^{③④} 瓦西里耶夫：《战国策》（К.В. Васильев, Планы сражающихся царств, Москва, 1968），第123~124页。